



终成 眷属

彭万昌 ©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终成眷属

彭万昌 ◎ 著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终成眷属 / 彭万昌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2

ISBN 978-7-5354-8622-6

I. ①终… II. ①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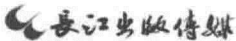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0380 号

责任编辑: 余 慧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陶匠图文

责任印制: 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立信邦和彩色有限公司

开本: 64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 18.5

版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07 千字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前言

这是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笔者就是小说中曾望厚的本家兄长。我深深地被他们为了得到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份纯真的爱情，不畏强权遗俗所迫，不为功名利禄所动，历尽千辛万苦，饱尝酸甜苦辣，受尽人间磨难，直到失去工作，失去亲人，而不折不挠地追求的精神所感动。

从他们的爱情经历中，笔者深深地体会到，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工作，还是婚姻爱情，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学会坚忍不拔、执着追求，永不气馁，既是一种毅力，也是一种境界。每个人一生中都要走过平坦或曲折的路，有的人在风雨中匍匐，有的叹息，有的却勇往直前。世界与我，互相而已。人生在世，唯有情最重。人生变幻，尽在不言中，唯有一份经世的温暖与我们相牵相连，维系我们一生，让我们感到踏实快乐，备感幸福。有人说“人生最难找的是知音，最难解释的是幸福”，玉华对幸福做了最精辟的概括，她说：“幸福是一种感觉。”她一生的愿望就是能和望厚结合，实现愿望就是幸福。

今天，曾望厚和汪玉华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夫老妻了，两人均是教授级的主任医师，在平江市开有私人诊所，并买有两套住房。他们和两个女儿、女婿、外孙女住在一起，过着甜蜜而幸福的生活。

终成眷属

为表达对他们的爱慕之情，并让广大读者分享他们艰辛、曲折和甜美的爱情，笔者虽已年逾古稀，但在他们那种精神的鼓舞下，以极大的毅力克服了老眼昏花、记忆减退的困难（有时为了表达一个意思，不惜花大量的时间请教《词典》，去寻找我那儿时就熟悉的“生字”），耗时三年，终于了却了我的心愿。现奉献给广大读者。

还要说明一点：因担心小说出版发行后，可能会给他们的活活的生活带来一丝涟漪，故将他们的真实姓名隐去。书中的曾望厚、汪玉华、杨小芹等全是化名，敬请读者原谅。

笔 者

2014年10月30日

第一章

火红的太阳挂在天空，红彤彤、火辣辣、滚烫烫的。

它将大地连同地上长的庄稼全烘热了，烤熟了。夏天说到就到了。

今年五同大队的夏粮获得了大丰收。大片大片的小麦金灿灿、黄澄澄、硕鼓鼓、齐刷刷地高昂着头，火南风吹拂着麦穗，泛起层层金色的波浪。

生产队的高音喇叭播放着“麦浪滚滚闪金光，社员人人心欢畅”的歌曲；秧田里邓鸡声声，麦穗上麻雀喳喳，树梢上杜鹃鸣叫，知了在树林中愉快地歌唱，如交响乐一般的动听。田野上到处飘扬着欢乐的歌声洋溢着丰收的景象。

不计其数的麦黄鸟（形如麻雀，但与麻雀不同的是候鸟，每年麦黄时飞来，麦子收割完后就飞走，而本地麻雀是常年在—一个地方，不随季节变化而迁徙）遮天蔽日的黑压压的如乌云般地飞来。它们降落在麦穗上，兴高采烈地叽叽喳喳地分享着社员们的劳动果实。

为了驱赶这些麦黄鸟，生产队派了许多年纪较大的男社员分别站在麦田边拼命地用木棍敲着竹扁担，边敲边吆喝，拼命地敲，嘶声竭力地吆喝。这些鸟刚听到敲击声还有点害怕，但

时间长了，它们觉得没什么危险，不仅不飞，还以为是社员们在敲锣打鼓地欢迎它们，毫不客气地享受着人们为它们准备的盛宴。于是社员们就放鞭炮，放铳。（用铁铸的有四个孔，每孔放炸药和引信，每装一次药，可以放四铳，农村男女青年结婚时常用它凑热闹显威风。铳没有子弹，但放起来非常响，比鞭炮还响，周围几里路远都听得见。如果在铳眼内放些铁珠子，便可做武器打仗）这下可把麦黄鸟吓坏了，它们一听到铳声，赶紧扇动起无数的翅膀，逃命似的惊叫，高高飞起，如一团团乌云，席卷到远处的麦田。于是远处又响起了吆喝声、鞭炮声、放铳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

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不知怎么知道了这种情况，我分析可能是“麦苗儿青青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了咱农庄”时，听到社员们反映的，亦或是记者们用《内参》向他老人家反映的。于是下达指示，将麻雀列为“四害”（老鼠、麻雀、蟑螂、臭虫）之列，号召全国共诛之，全民共灭之。为了响应毛主席号召，男女老幼到处打麻雀，大人用鸟枪、气枪打，小孩子用弹弓打，白天打，晚上捉。孩子们夜晚搬上梯子，打着手电筒挨家挨户地在屋檐下捉麻雀。麻雀也冤枉，前面讲了，麦黄鸟形如麻雀，但并不是麻雀。正如青蛙恨蛇，将同属农民朋友的无辜的蚯蚓当成小蛇狠心地吃掉一样。人类社会有冤案，自然界也有冤案。麻雀也怪，晚上用手电筒一照，它就眼花（青蛙也一样，很多人夜晚用手电筒在塘里捉青蛙），一动不动地让你去捉，有的人一晚上捉几十只甚至上百只。如果运气好，还可能碰上窝里刚孵出来的肉老鼠似的小麻雀，一次就是五六只甚至上十只。他们把捉到的麻雀用袋子装着放进塘里，将其淹死后，刮去皮毛油炸，一口一个，既酥又香，如果加点佐料红烧着吃，味道极鲜。

麻雀做窝一般不在树上，而是在社员们的屋檐，茅草屋的檐下居多。由于人们每天晚上去捉，这一带的麻雀几乎快捕绝种了。

不知什么时候，人们又为麻雀平反了，说麻雀是中性鸟，既有害也有益，并且益大于害。说麻雀虽然吃粮食，但也吃害虫。它们抚育小鸟时每天要捉许多害虫喂幼鸟，是农民的朋友，应予以保护。毛主席他老人家也大度，平反就平反，毛泽东思想照样光芒四射。再说小小麻雀，不再捕杀，让你活下去就算不错了，你还能翻得起大浪！因此麻雀才幸免绝种，得以繁衍至今。所以说任何人都有犯错误、说错话、办错事的时候，孔子是公认的圣人，他也说过错话，他说“唯女子和小人难养矣”，他没想到话一出口，伤了他妈妈和奶奶。孟子比他聪明，“鸡鸣狗盗”等小人全部笑纳。所以一切要讲科学，要一分为二。我不是歌颂小偷，小偷确实可恨、讨厌，应该惩治。有的农民工一年到头积攒的工资钱，如果在春节回家的路上被小偷偷去了，多惨呀，当时如果捉到小偷，恨不得将其千刀万剐。但法律上规定小偷没有死罪，谋财害命的除外。

是谁发明并制定了农历二十四个节气（正月立春，雨水；二月惊蛰；春分；三月清明，谷雨；四月立夏，小满；五月芒种，夏至；六月小暑，大暑；七月立秋，处暑；八月白露，秋分；九月寒露，霜降；十月立冬，小雪；冬月大雪，冬至；腊月小寒，大寒），这些节气可能是根据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气候制定的。要不，制定这些节气的人就生活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你看，江南一带立春，就意味着春天的来临。有人做过试验，在地上挖一个几米深的洞，在洞底放一束毫毛，几点几分几秒立春时刻一到毫毛就开始向上飘浮。立夏就标志着夏天的开始。当春风又绿江南岸，桃红李白掩人家时，东北内蒙古还是冰封大地，银装素裹，漫天遍野雪花飞舞。而广东、广西已是烈日当空，热浪滚滚，沃野平川稻谷喷香时候了。同样的季节，气候大不一样。

五同大队地处江汉平原东部的汉江边，对二十四节气十分敏感。“小满节气（特指小麦扬花授粉后，已灌浆结籽，属半饱满状态）过后没有几天的工夫，麦子全黄了。”真可谓“麦熟一

响，蚕老一时”。“谷雨”节气播的谷种已长成秧苗，“芒种”就开始插秧了。所以农村这个时候特别忙，插秧割麦两头忙，白天黑夜的忙，含着饭跑的忙。成熟的麦子要收割后赶种秋粮，长大的秧苗要抢季节赶紧插下去。常言道，春争一日，夏争一时，早晨插的秧比中午插的早熟几天，那不是“只争朝夕”，而是争分夺秒。当地有首歌词就是当时的写照。歌词的大意是“告诉我的爹呀，告诉我的妈呀，不是姑娘不想家，栽秧割麦两头忙，哪有闲心回娘家……等到今年丰收了，带着喜讯看爹妈。”

当时农村文娱生活非常贫乏，他们的娱乐就是男女之间在田间劳动时嬉嬉打打，讲笑话打发时间，偶尔也有唱歌唱戏的，但很少，没有乐器伴奏，唱得也不好听，属自娱自乐，自我欣赏。绝大多数社员劳动一天后晚上回家，既没有收音机听，也没有电视看，吃了饭没事干就和老婆干那个事。所以农村每家每户小孩特别多，一家五六个非常普遍，有的家七八个小孩，像放羊的一大群。每个小孩的间隔年龄都不大，有的只间隔一岁，一般是间隔一岁半至两岁。农村忙的时候，白天都不清点小孩的数，只有到晚上给小孩洗澡时，一盆子热水先老大，后老二，然后老三、老四挨个洗。如果发现谁没洗，就到处寻找。房里床上，禾场上的柴垛子边到处找。发现哪个孩子在柴垛边睡着了，就抱回家不洗了，直接往床上丢。

这天中午社员们在田里插秧，生产队吃中饭铃声响了。说是铃声，其实是犁铧上面的一块铁，用绳子系着吊在树上，用小铁锤或铁棍在铁块上敲击所发出的声音。两下连敲为出工，三下连敲为收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插秧的社员们听到收工铃声响后，齐刷刷地直起身子，有的捶着背，有的伸着腰，舒坦着一个上午的疲劳，然后又弯下腰用秧田的水洗着泥把腿子和手，准备回家。只有张八斤、李憨吧和王黑狗三人鬼鬼祟祟在一起互相耳语了几句后，突然向身边一个30来岁的女的发起了进攻。他们像三匹豺狼围攻一只猎物似的分别从三

个方向用双手朝这个女的身上拼命地泼水。这个女的叫陈彩萍，是曾家的一个小嫂子。样子虽然长得秀气，但大方泼辣，口无遮拦，爱开玩笑，外号叫陈垮垮。经常开别人的玩笑，有时还搞些恶作剧，欠下许多“债”。队里很多小叔子、小哥哥、大弟弟都吃过她的亏，大家总想找个机会报复她一下。今天机会来了。他们看见彩萍穿一身水红绸子衣服，比较透。如果将她的衣服全部浇湿，让绸子贴在身上，一定更透。过去农村妇女不象城里人，有胸罩和内裤，如天气热时，全身只穿一件上衣和一条裤子。彩萍正低着头洗手准备回家，毫无思想准备，不到两分钟，衣服裤子全给憋吧、黑狗、八斤浇得透湿。绸子见水就贴着肉，搞得彩萍像没穿衣服一样，赤条条地暴露在插秧的众男女社员中间。“断子绝孙的，不得好死的。”彩萍边骂，边用双手将湿裤子提着往外拉，以防裤子贴肉。但提了裤子，上身的衣服又紧紧地粘在胸前，一个个拍着巴掌高喊着好哇、好哇！痛快呀，痛快！过瘾、过瘾！小姑娘们实在看不过去，有的上前帮她将衣服拉开，有的拿揩汗的毛巾将她胸前遮着，有的用草帽将她下身挡着。才算帮她解脱困境。

杨小芹是个20刚出头的小姑娘，县里派到五同大队三队的扶贫脱困工作队的队员，她从小在县城长大，从没看见过这样的场面。刚开始她感到羞涩不好意思，用手将两只眼睛蒙着，后来看见其他姐妹都去帮忙，她也立即上前用自己的身体挡着小伙子们的目光，并拥着彩萍朝家里跑去……

彩萍边跑边骂：“死短寿的，死短寿的，看看老娘如何收拾你们。”

第二章

五同大队是河沙公社最落后的生产大队之一，人称是屎尿不生蛆的地方，历来就穷。它地处汉江边，堤里堤外地势一样高，所以，这个地方地势低洼，常年积水。为了不让河水泛滥，人们用泥土做了两道堤，让河水在堤内流。这里新中国成立前十年九灾，全队几百户没有几家不讨米要饭的。住的请一色的茅草屋（屋顶用麦秆、茅草或稻草盖的，周围用高粱梗编织后再用泥巴和稻草糊上），屋顶上爬有南瓜藤，南瓜压穿屋顶后，一个个挂在梁上，就像一串串大红灯笼，颇为壮观。

这里的人遇上荒年，夏天以湖里的牛尾巴草和菱果野菜为生，冬天在湖里挖藕、摸蚌壳、螺蛳、鱼虾度日。全村只有十几户是中农，其余全是贫雇农。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大兴水利，开渠、挖河、建闸、消灭水患，才使这里人们得以安生，农业生产也开始慢慢恢复，群众生活也有了改善。所以，这里的人对党感恩戴德，男女老少全会唱“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那时候的人也单纯，知恩图报。共产党把他们从饥寒交迫中解放出来，能有稀饭填饱肚子，就心满意足了。请不扯了，不扯了，还是说五同大队如何落后吧。

五同大队后进，老实讲，有客观环境的原因，也有人为的主观原因。所谓客观环境原因就是这里地势低洼积水，土壤偏沙，保水保肥性差，人称“三沙”市。即起风沙扬（洋），下雨沙实（市），天晴沙糊（这里人称“烫”为糊）。人为主观原因就是这里穷呀，后进呀，县里年年派工作队来“改造”。

那时候叫“改造”，特指对阶级敌人而言。如对犯罪分子劳动改造呀，对地主、富农监督改造呀，等等。五同大队没有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全部是贫下中农，都是革命的依靠对象，改造谁呀？人不能改造就改造自然。毛主席说了“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没有人斗，无法斗天，只好斗地。工作组进村第一件事就是号召“农业学大寨”。你看人家大寨人多珍惜土地呀？他们开山运土造梯田。造一亩地多难啊！五同大队大塘小堰、大沟小渠占了多少土地呀，多可惜呀！于是工作队研究决定将所有塘堰填平造田，除留几条大的排水渠外，其他小沟一律用水泥管代替。水泥管埋在地下，如城市下水道，水管上面填土种庄稼。所有大坟小坟，无论是谁的祖坟，一律铲除深埋。这样，一个生产大队一下子增加农田面积几百亩。以一亩田收1000斤稻子计算，一年可增几十万斤粮食，仅此一笔足矣。五同大队还能不脱贫致富？工作队这样盘算着。

土地通过“改造”后，一平如镜，广阔无垠，一眼望不到边。上面耕作成同样大小的一方块一方块的农田后，从空中往下看，如铺在大地上的马赛克瓷砖，甚为整齐、美丽、壮观。社员们在方块地上种上小麦，并根据其汉字的形状在不同的“马赛克”方块上栽上油菜，由不同的方块油菜组成“农业学大寨”和“人民公社好”两条特大标语，如现在城市的电子广告牌。到了阳春三月，油菜花儿黄，麦儿苗儿青，“大标语”在阳光的照耀下，如金色的宝石镶嵌在绿色地毯上，使本来美丽壮观的土地更加美丽壮观。绿油油的麦苗将大地染得无边无际，金灿灿的油菜花

喷吐着醉人的芬芳，点缀其间的劳作的人们如入仙境，心旷神怡。县里请来航拍，从空中拍摄成照片，以“神州处处沐春光，锦绣中华美如画”为题登在《人民画报》上后，招来了成千上万的参观者。

当时社员们穷，生产队管得又严，不兴旅游，不搞旅游经济，要是现在，五同大队可要发大财了。什么“田园风光游”呀，“农家乐”呀，“乡土菜”呀，“有机农产品”呀，都是可以赚钱发财的呀！但当时不行，当时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经济头脑，人家来参观学习，怎么好意思去收别人的钱呢？当时来的都是各县组织的公社、大队两级干部前来参观学习的。开始来的人不多，由五同大队接待。为热情招待客人，大队部喂的几头猪杀光了。后来人来多了，络绎不绝地来，成群结队地来，一车一车地来，大队负担不起了，就由县政府派干部负责接待。他们在生产队的禾场上用芦席、晒顶搭起了棚子，在棚内摆上餐桌，并支起锅灶（农村里男女青年结婚办喜事时都是这样）做饭，开流水席，日夜不停地接待。送走一波又一波，迎来一批又一批。社员们组成欢迎乐队，站在村头的路口，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地迎接各地参观的客人。一时节，五同大队的名字叫得震天响，报上有名，广播有声，幻灯（当时没拍成新闻纪录片，只做成了幻灯）有影，到处宣传，后进的五同大队竟成为全县红极一时的先进典型。

县里派驻五同大队的工作组也被县委、县政府树为“帮贫济困改造后进的模范工作队”。他们披红戴花到处介绍“经验”，受到各级政府的好评。

但好景不长。清明节后，是冬夏季节转换的时候，天气说变就变。昨天还是艳阳高照，春江水暖，百花争艳。今天却是北风呼啸、雷声大震、暴雨倾盆，落花流水。暴雨一下就是三四天，五同大队平地起水一尺多深。因塘堰被填，排水明渠太少，加之这里本来地势就低洼，水一时排不出去，广大农田

顿成泽国，一片汪洋。泥水淹没了麦苗，漫过了油菜，狂风掀起的浊浪冲走了美丽的景色，冲走了欢乐的气氛，冲走了人们的所有希望。

社员们好像并不太着急，因为这里过去经常闹水灾，他们已习以为常了。春天正是鱼类繁殖的时候。农田被水淹没后，好多鲤鱼、鲫鱼、鳊鱼在麦田和油菜田里扳籽（这一带的人称鱼产籽为扳籽）。它们在麦苗上、菜花间互相嬉戏追逐，银白色肚皮露出水面，搅得水花四溅。整个麦田到处都是鱼在扳籽，老远就看得见。这可是人们捕鱼的大好机会到了。他们拿着罩（用篾编的比箩筐大一些的圆筒筒，下面大，上面小，圆锥形，无底无盖），见鱼就罩。一天可罩几十斤鱼，个个高兴极了。

这次淹水与过去不同。过去也经常淹水，但地上有高处，有大小坟堆，狗獾、野猫、野兔、老鼠和蛇在坟堆上面挖有洞，可以高处洞里藏身。现在高处铲平了，坟也挖掉了，一展平洋，水来了无处栖身，个个头露在外面在水里到处游。社员们拿着棍棒，到处打野猫、野兔，见头就打，有的人一天打十几只野兔、野猫。特别是獾子，有猫獾和狗獾两种，个小的叫猫獾，个大的叫狗獾，小的几斤，大的十几斤，打两只就是十几斤，几十斤。社员们个个乐呵呵的，过节似的高兴。

工作组和大队干部可急了，他们白天泥里水里到处排渍，夜晚开会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如何尽量减少损失，挽回影响，个个食不甘，寝不眠，痛心疾首。

教训啊，多么惨痛的教训啊！哪有这样“学大寨”的呢？一个是山区，一个是湖区，地理条件、气候条件决然不同。怎么能不加区别地照搬照套呢？这里为什么叫“五同”啊？因为它是由五个自然村组成的一个生产大队，有五村同心之意。由傅家台村、陈家台村、蔡家台村、袁家台村和李家台村组成。为什么每个村前面还有个“台”呢？就是因为这里过去是洞庭湖，地势低洼，每家每户必须挑很高的一个“台”（一般有1米高），

再在“台”上做房子，否则，下雨必淹。筑台取土的地方便成了塘，每家每户“台”挨着“台”，便成了一条长长的“堤”，挖土的塘连起来便成了“河”，河再连着沟渠，既可以蓄水，又可以排水。那里的农田也是这样，一丘旱地，一丘水田。人们将水田的土往旱地上挑，高处种棉花，低处种水稻。下雨时，水田可以蓄水、排水，避免旱地受渍，相得益彰。这里的农民平均每人三亩多地，耕地不成问题。主要矛盾是怕水，而不是缺地。你现在将旱地和水田推得一样平，甚至连历年留下的蓄水、排水的塘堰、沟渠全搞掉了，怎能保证下大雨不受淹呢？如果现在不被淹，到了夏季大旱怎么办呢？塘、堰、渠没了，沟的水也流走了，哪里弄水来灌溉呀？庄稼不旱死才怪呢！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懂吗？！“大”字不识的老农民都知道“收多收少在于肥，有收无收在于水”，这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大灾面前群众竟没什么怨言，这是现在的人不可想象的。那时的人从没想过发财，生产队分点粮，自己用鸡蛋换点油盐足够了，糊饱肚子是他们最大的满足。虽然也有个别人发点牢骚，说点俏皮话，但马上被其他人劝止了。他们说人家是为我们好，你看人家县委杨书记离开舒适的县城，到我们农村和我们泥里水里一干就是几个月，人家图的啥？还不是为我们早日脱贫致富啊！这话一说，大家都哑口无声，服了。再说，他们有个相当大的把握：有党，有政府。政府是不会让一个人饿死的。

真的，没过几天，县里拨下来的粟种、大豆种、荞麦种都到了，还有白菜籽，杭州萝卜籽等各种蔬菜种子都运来了。工作队又开始号召社员“困难面前不低头，夏粮损失秋粮补，齐心协力与天斗，团结抗灾跟党走”。经这么一动员，大家的积极性又高涨起来。于是，五同大队一场战天斗地赶种秋粮的战斗又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第三章

县委杨书记是谁？就是县委副书记杨泽伟。地方上不像部队称呼职务时，正副职务分开叫，如张政委、李副政委、王团长、陈副团长。他们不管你是书记、副书记、县长、副县长，一律叫某书记、某县长。所以，群众都称呼杨泽伟为县委书记。

杨泽伟现年48岁，山西昔阳县人，“大寨”就在昔阳县。1949年随军南下来到江阳县，开始在一个区里搞区长、区委书记，1972年提拔为县委副书记，分管农村工作，兼任县政府“改造后进生产队领导小组组长”，五同大队是他改造后进工作的点。这个同志年富力强，身体好，事业心强，办事雷厉风行，有一种部队军人的作风，特别是能吃苦，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为人随和，没有官架子，能和群众打成一片。五同大队平整土地时，他日夜和社员们一起干，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名副其实地和群众“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群众都亲切地称呼他“老杨”。

那时候的人与人之间，关系融洽，感情真挚，群众当着书记的面喊“老杨”，背着老杨的面称书记。

那时候的县级干部下乡一般没有专车，也不穿西服打领带。骑个破自行车，披着一件旧棉袄，穿上一双解放鞋，戴顶草帽，

与普通群众没多大区别。干部下乡严格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杨泽伟在五同大队蹲了两年点,就吃住在五同三队队长曾为民家。

曾为民家土改时划为雇农,有三弟兄,老大曾为普,他是老二,老三叫曾石头。父母亲在他们未成年时就去世了,留下他们三弟兄相依为命,到处扛长工、打短工。夏天远离家乡,到一百多里路以外的应城县、京山县打工,帮别人插秧、割谷。冬天,农作物归仓后,他们就到处打鱼、摸虾、砍柴、挖野菜度日。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帮他们搞农田水利建设,基本消除水患,日子才慢慢地好起来。三弟兄长相差不多,但性格、为人各异。

老大曾为普,勤劳俭朴,但很自私。无论搞什么,总想占点小便宜,人称“油抹布”(抹到哪粘到哪)。如生产队里庄稼发蚜虫,叫他打药。灭蚜虫的药是棉油皂(用棉籽榨的油加工而成的肥皂,这种棉油皂形状如一块块的肥皂,也有洗衣服去污的功能。棉油皂化成水后,用喷雾器喷在长蚜虫的庄稼上,肥皂水在庄稼上被风吹或太阳晒干后,表面结成一层如塑料薄膜一样的膜,将蚜虫死死地蒙在膜里面,让蚜虫在没有空气的膜里面窒息而死),他就借机拿一小块装进自己的口袋或干脆用棉油皂在自己的衣服上到处糊一层,省得洗衣服时再打肥皂。队里摘棉花时,他每次装几朵带回家,然后用手去掉棉籽,一年积累下来的棉花可以打一床棉絮。所以,他家一年一床新棉被,冬天不怕冷。队里收割稻子时,他总要一次拿几刁稻子回家喂鸡。他家有二个厕所,一个大的是装猪粪、牛粪、草木灰的。大厕所的粪兑上水后给公家换工分,(两满桶粪一个工分)肥生产队的庄稼。屋后还有一个小茅缸,装的是自己家的人粪尿和鸡粪。农村的人都知道猪粪、牛粪肥效差,是下等肥。人粪尿是“大粪”、精肥。牛粪、马粪都是吃草屙的粪,草的营养本来就少,经过牛、马消化吸收后屙出来的粪肥效更差,苍蝇叮了也很少长蛆,有